

主编·陈国民·俞正殿·陈隆涛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大地重光

记八年抗战

援 马惠英 李肖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大地重光

常迺媛 马惠英 李 肖 著

——
记八年抗战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晋〕新登字 3 号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左执中 张宝东
装帧设计 易 一

大 地 重 光

——记八年抗战

常迺媛 马惠英 李 肖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22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440—0742—1

G·743 定价:5.60 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薄一波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

序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场战争却依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在中国烧杀抢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汉奸败类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种种丑恶卑劣行径；不愿做奴隶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奋起杀敌、浴血抗战，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最为辉煌的篇章，永远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育。

抗日战争是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我国的独立和振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解放的斗争，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工农商学兵各族各界人民广泛参加的反侵略战争。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维

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外敌侵略、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重温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注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发展,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迎接中华民族现代发展过程中光辉灿烂的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出版了。它以鲜明的爱憎、生动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可以帮助青少年读者了解这段历史,从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中受到震撼和启迪,以激发爱我中华、锐意进取、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壮志豪情。尽管丛书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全貌,在构思与人物、事件的选择上也不是尽善尽美,但对青少年进行切实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它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材料。

杨成武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目 录

全面抗战的爆发	(1)
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开辟	(17)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26)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35)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46)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59)
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71)
抗联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77)
共产党坚持抗战和打退国民党的反 共高潮	(88)
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	(109)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继续溃败	(128)
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143)
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157)
抗战的最后胜利	(167)

全面抗战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一 从“九·一八”说起

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统治者对外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他们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首要目标，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为了推行大陆政策，日本侵略者在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

年又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又夺取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特权，并且在大连设立关东军司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的山东，并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了之后，日本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军事协定，把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几乎独霸了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形成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和统治世界的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使得中国由日本独霸又恢复到以前列强共管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不甘心的。1927年4月，日本反动政客田中义一上台，担任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他于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集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外务省的重要头目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开了一个所谓的“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如何加紧侵略中国的问题，通过了《对华政策纲要》，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会后，日本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终于在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股风暴于1930年3月袭击到日本。从输往美国的主要商品生丝开始，迅速蔓延到纺织工业，不久，日本对外贸易、工业生产全面急剧下降。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城市中的劳资争议和农村中的租佃纠纷接连不断，这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空前的困境。在这种情

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决定趁英美等国忙于内部事务，中国国民党正用全力进行内战的机会，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1931年8月，日本声称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兴安岭一带“失踪”，并以此为借口大量向东北增兵。9月上旬，日本军队开始在沈阳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示威。驻在沈阳郊区的日本军队架起了大炮，把炮口对准沈阳城。日本侵略者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做好了准备。

1931年9月18日，沈阳近郊的柳条湖突然发生了铁路爆炸事件。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中尉，带着6名士兵来到东北军驻军的北大营西南800米的柳条湖，偷偷地把42包小型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路轨上。22点20分点燃了导火线，轰隆一声巨响，炸弯了1.5米钢轨。其实，这次爆炸的损害并不太严重。20分钟以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还能够正常驶过爆炸地点，安全抵达沈阳车站。但是，日本侵略者却抓住这一爆炸事件，硬说是中国军队为了袭击日本守备队而破坏的。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势，到第二天清晨5点30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接着，占领了沈阳全城。

日军占领沈阳后，在全城进行了血腥屠杀、抢劫。据估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7亿元以上。同时，东北军保存完好的飞机大炮和枪支弹药等大批军械器材都统统落入日军之手。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寻事挑衅和肆意扩大侵略，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作任何抵抗准备。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

石多次电令张学良，要他对日本在东北的寻衅“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在东北的军队有16.5万人。但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国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由于国民党政府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不到半年，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河山，无尽的宝藏，都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断送了。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强占土地，残酷剥削压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东北3000万同胞过着非人的亡国奴生活。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驻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率领下奋起抵抗，打死打伤日军1万多人，但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给十九路军调派援军、接济军火，还暗地里供给日军物资。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十九路军最后弹尽援绝，被迫撤退。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驻留上海。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省。接着，日军进攻长城要塞，逼近北平、天津。华北局势十分危险。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把河北东部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那里驻扎。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派大批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和天津。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答应撤退河北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想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和国民党的妥协退让相反，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沿。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党就发表了反对侵略和对日本宣战的宣言、通电，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许多支游击队成立了，并且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后来，在红军长征的路上，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后，党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还注意向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国民党内部加剧分

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在陕北进攻红军，不断遭到失败，感到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友好的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人去见他，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这样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十分生气，他命令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36年8月28日，国民党特务在西北饭店抓走了张学良的秘书、地下党派到东北军中工作的宋黎和马绍周，张学良听到消息后派人去打听核实，结果连派去的人也被特务抓去。这使张学良很生气，他立刻派兵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把被抓去的人夺了回来，并查抄了特务的档案文件。蒋介石得知这个情况，更是咬牙切齿。

1936年10月，蒋介石坐飞机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红军。张学良天天劝蒋联共抗日，蒋介石却训斥张、杨，说他们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还说什么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不忠不孝，对这种军人“要予以制裁”。接着蒋介石离开西安去调兵遣将，部署停当后，于12月4日第二次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纷纷开赴潼关，战斗机和轰炸机一队接

一队地降落西安机场，蒋的亲信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住在西安招待所。这时，蒋介石提出两个办法逼迫张、杨表态：一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立即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把陕、甘两省让出来，由中央军去“进剿”。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第一种办法，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的实力就会被消灭，而且他们的部队也根本不愿同红军作战；要是接受第二种办法，离开西北，两军再分开，势必被蒋介石各个击破，这无疑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他们商定，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反共政策，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如果“哭谏”无效，就实行“兵谏”！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他先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倾诉他抗日爱国的热忱，继而同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次“哭谏”长达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是不能改变的。”“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决定进行“兵谏”。12月9日，西安学生1万多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学生，激起了学生的满腔怒火，于是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给张学良打电话，要他去镇压，并说：“格杀勿论。”张学良放下电话，赶紧乘汽车追上了请愿队伍，劝学生不要去见蒋介石。一

名东北大学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说罢放声大哭，群众也失声痛哭起来。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了张学良的爱国勇气。他对群众说：“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

12月11日夜里，张学良召集亲信，宣布了与杨虎城商定的“兵谏”计划，随即率领他们前往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在那里成立了临时指挥部，与杨共同指挥这一行动。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卫士营的1连亲信卫士，在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十七路军也把蒋介石亲信大将陈诚等10余人一起囚禁在招待所大厅里。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核心的八项要求。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亲日派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并轰炸西安，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则竭力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进行“讨伐”。宋美龄一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恳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一面又会同宋子文、孔祥熙等商量对抗亲日派、营救蒋介石的对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给中共中央打电报，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高瞻远瞩，提出在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党中央派周恩来、秦

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西安调停。12月23日，谈判开始。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谈。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以“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为核心的六项协议。这样，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 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

资本主义世界在1937年又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妄想从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寻找出路。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的计划。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早在1936年9月，日军就已经侵占了北平西南的丰台（丰台现在是北京的近郊），作为切断中国华北与南方联系的重要军事据点。这样，北平、天津一带成了国防前线。当时的形势是：从丰台到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日本军队驻扎；北平东面的通县，建立了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北面的热河（热河省，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辽宁省的一部分）、察哈尔北部（察哈尔省，是今天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已被敌伪军队控制；北平的西北面由汉奸李守信和王英的伪军控制，只有西南面尚为中国军队驻防。因此，地处平汉

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门户。日军如果占领了卢沟桥，就等于封闭了北平的南大门，就可以孤立平、津，迫使国民党当局不战而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就以卢沟桥为突破点，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这天傍晚，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城外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到22点30分左右演习停止，日军开始集合。这时，突然附近响起几声枪声，接着，日军便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这显然是一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因为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城门早已关闭，怎么会把演习的日军士兵丢失到城里去呢？同时，中国的守军经过检查所携带的子弹，证明无放枪之事。于是，中国守军拒绝了日军要进城搜查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就对宛平城进行包围和挑衅。8日，日军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河堤上的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猛攻。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师）二一九团（吉星文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官兵们奋起抵抗，全面抗日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日本侵略军对卢沟桥的进攻，激怒了中国人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立即动员起来，坚决打击侵略者。同时，中国工农红军也发出通电，宣布愿作二十九军的后盾，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人民，特别是处于前线的华北人民，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下，积极地支援二十九军抗战。7月8日，长辛店工人收集了大批的铁轨、枕木、麻袋，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前